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1

观察深浅与铸就经典：当代学者钱念孙的文艺观念与科技伦理探析

王浩楠¹

(¹ 澳门大学, 中国 澳门 999078)

摘要：《文学的俯察与仰观》作为展现当代学者钱念孙文学评论与文艺思想的经典文集，充分反映了其对文艺创作的深层观察和本质探讨、对科技发展的理性审视和价值判断。本文沿循“俯察与仰观”的方法论，从文艺作品的创作底蕴与意义、人工智能的深层挑战与省思，以及外国文学的融汇吸收与影响等问题视角出发，探讨钱念孙的创作理念、文艺观察与文化视野，揭示文艺的内在审美与形式构建。以作品创作者和科技运用者为主体，表明文艺经典既需回溯历史经验事实，也需聚焦当下社会风貌；文艺鉴赏既需立足本土审美传统，也需吸收异域文化精粹；文艺精神既需提升艺术品味修养，也需开拓思想精神境界。

关键词：《文学的俯察与仰观》；文艺评论；人工智能写作；外国文学；文化接受与变形

一、引言

钱念孙，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文艺学、美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生涯以跨文化视野和理论创新见长，其研究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尤其擅长从接受美学、文化比较等角度剖析文学的民族化、现代化问题。钱念孙的学术成果丰硕，除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外，还著有《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国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等学术专著，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

《文学的俯察与仰观》^[1]是钱念孙的代表性文集，收录了其多年来的重要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此作品的书名取自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之句，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而且隐喻了作者研究文艺的双重视角。“俯察”微观的文本肌理与创作实践，意味着要亲身躬行，扎根生活，品味世间冷暖，感知生活变迁；“仰观”宏大的文化传统与时代思潮，表明了要恪守本心，归纳总结，辨明人性是非，开掘崇高之美。“俯察与仰观”这一方法论贯穿全书，既彰显了钱念孙对文艺本体的深刻洞察，又体现了其融通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全球的学术格局。文集中辑录的论文与评论，既涵盖对经典作家创作理念的再阐释，亦涉及对人工智能写作、外国文学民族化等关键议题的批判性思考，展现了其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的广度与深度。

二、文艺作品的创作底蕴与意义

文艺家的根本意义就是以内在心灵琢磨生活，以内在心灵外化艺术。不论是文字语言、影视传媒，抑或编曲奏乐、绘画设计，文化艺术创作在生活实践中的展现是需要不断切磋琢磨、合于时世的。每个人的真实性就在于生活的现实性，文艺的琢磨性也源于日常的思想性，文艺家的观察与体悟、情绪与灵感、身份与际遇皆可以在作品中体现真材实料与真情实感。这也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对创作者而言，反映生活情感、遵循时事变化既是一种历史精神，也是一种时代责任。

钱念孙在《从琢磨生活到表现生活》中讲述了傅雷对张爱玲创作题材的评论。傅雷在其《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认为张爱玲的故事题材囿于男女情愫，且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张爱玲的写作风格和

作者简介：王浩楠（2002—），男，浙江乐清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宗教学系硕士研究生。

背景设定是与其本人经历境遇相类似、相呼应的，但傅雷仍指出了其不足之处。由此可见，生活体验与经历于文艺创作者而言是因人而异、各具特点的。当一位作家以其个人视角观察其他作家时，既可有肯定与赞许，亦会有批评与反思。这也足以反映生活经验和文艺思考之于创作个体的复杂性、特殊性与丰富性。进而，钱念孙在此文中也对其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创作思考产生回忆与联想。他通过一次乡村住宿活动，从而引发了对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性思考，从城乡发展的差异与变迁，城乡居民矛盾与妥协以及城乡生活的现状与未来出发，延伸出独具生活韵味与时代特点的文学情节创作构思。

琢磨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心灵记忆与感受转化为艺术的智慧与美感，展现艺术的哲理与意蕴。若是仅限于传达现实层面的信息与普通生活的内容，那么文艺的深刻意义就将遭受折损。钱念孙认为，琢磨生活是“炼意”，而表现生活是“炼句”。由此更具体而言，炼意是提炼思想内核、锤炼情感表达、修炼意涵深度；炼句则是为了凝练现实感官、磨练艺术造诣、熔炼虚实之美。从炼意的角度来讲，意境的深远优美、雅致经典既来源于历史的回溯，也来源于当下的开拓。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讲：“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2]在文艺创作中，炼意之柱础就在于知晓历史脉络以构建现实框架，梳理文化记忆以明确主题思路，最终实现历史经验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同时，从炼句的角度讲，创作是基于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在意境底蕴之上的艺术拓展、审美塑造与哲学探索。布洛赫笔下的历史之论犹如文艺之辨，“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2]文艺的意境如果无历史文化的底蕴根基，无广阔综合的视野架构，无古今相融的人文性质，那么将会成为虚无之意、管窥之景。

技术革命与消费浪潮的形成与兴起，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范畴的发展与繁荣，促使文艺理论讨论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资讯与思想、科学与人文、时尚与文艺彼此交融互渗。就文学领域而言，文学研究逐渐转向文化研究，从文本审美转变为视觉观赏，但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文学理论的简单泛化，而是当今时代信息密度爆炸与科技力量进步所催生的结果。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就强调，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探讨，但这些“理论”已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不再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实质上已经偏离了文学主体的范畴。^[3]这种理论泛化现象的本质，在于文学的关注对象包含了过多非文学因素，其焦点在社会媒介的转型发展之中发生了偏移。若放任理论研究的边界持续扩张，文学理论将会逐渐边缘化，文学也必然会遮其真貌，失其专精，丧其要点。

与之相应，整个文艺的扩容如今已成定势，网络文学、有声书、脱口秀、微电影、短视频等形式重塑了文艺的传播及呈现形态。钱念孙亦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他对于当下文艺作品态势的观察与批判。钱念孙认为目前的文艺创作良莠难辨，既有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启智之佳作，也不乏价值混乱、曲解真相的消极之劣作。在炼意层面，许多作品在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历史的回溯与反思、人性的审视与拷问等方面皆有不足与欠缺。在炼句层面，不论粗劣之作还是上乘之作皆有表现形式、思想观念、艺术手法、模式借鉴、内容创新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真正优秀之作的内涵意蕴不应被各种媒介与模式裹挟，而须坚守“表现生活”的使命。

无论是以冷静沉稳的心灵琢磨洞悉生活的细微之处，还是以热忱真挚的心灵描绘体现生活的深层之蕴，文艺家矢志不渝的任务就是攀登艺术之高峰。钱念孙在《经典作品的意蕴开掘和艺术超越》中谈及，攀登艺术高峰之阶梯是创作经典，反映艺术高峰之标杆是铸造佳作。经典之作之所以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能够推动一个社会的文艺创作，不仅在于其作品数量上的灿烂浩繁、不可胜数，更在于其作品质量上的精益求精，也就是去描摹人性，阐发真情，体验生活，揭示社会，精炼艺术，诉诸时代。意大利的当代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即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讲：“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4]这就意味着经典作品具有跨越时代与人际的作用，即使人们身处不同时空，身临不同环境，遭逢各种境遇，经典的思想光芒依然可以充分照耀心灵。

童庆炳教授发表的《文学经典结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其中专门探讨了经典作品的构成兼具若干要素，其中包含有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5]如何铸就经典作品，如何创造伟大文艺，结合钱念孙的思想，这其中也涉及复杂的问题。但从文艺家的创作主体性出发，创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刻画与反映，能否支撑涵盖广泛的“意蕴开掘和艺术超越”，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意蕴的挖掘可以反观出作品的艺术价值、阐释空间，对艺术的超越可以理解到文艺理论和作品的价值倾向，以及读者的阅读和思考视域。

钱念孙在《提升文学的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中毅然阐述，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作品的意境与格调全在于创作者的素质培育、内在修养与精神追求。欺诈与冷漠、绝望与罪恶、邪念与丑陋并不能成为最终倾向，不仅如此，文学正面积极、美善光明的主题是始终能够征服人心、铸就精品的。

由此可观,文学艺术的创作既需要回望历史、立足生活,也需要推陈出新、杜绝单一;既需琢磨巧思、追寻匠心,也需要体现意境,反映真理;既需要心怀博爱、摒弃阴暗,也需要讴歌人性、沐浴清朗。文艺与哲思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文艺家亦可是思想家。文艺家不仅要描绘浮世沧桑,知晓世道人心,还应当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展现人生命运的真谛。

三、人工智能的深层挑战与省思

在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有言:“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6]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及文艺的意义正名辩护,其本意旨在为确立文学的独立性,文学必须以文艺创作为中心,理论的研究也不能沦落为泛滥之文化、新兴之文化的纯粹附庸与过度衍生。但是除了经济与社会的作用,科技的信息力量与实践运用在文艺中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不容忽视。人工智能是继蒸汽、电气、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突出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生成文本内容的创作方式,根据智能程度,又可进一步分为自动写作和辅助写作。各类垂直大模型在图像算法、仿真虚拟等方面功效强大;各类通用大语言模型在文本生成、情感分析、语言处理等方面运用广泛。可以说,人工智能写作既成为了高等教育需要面对的课题,更成为了文艺创作不可回避的话题。

钱念孙在其《文学的浅涉与深耕——对人工智能写作的认识与回应》一文中开门见山,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雁,智能机器的运用节省人力资源与社会成本,改变了社会的运行轨迹和生活节奏。因此,他认为探讨人工智能创作的问题,从科技智能的角度,可以全面把握人工智能写作的特点和功能;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可以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内涵和价值。钱念孙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思考和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方面:第一,人工智能写作已有的优秀创意成果和表现形式;第二,人工智能写作对于价值判断的局限性与割裂性;第三,人工智能写作对于人类创作与审美的参照性与提升性,以及人类对此应有的内在反思与深入探索。

就人工智能已有的强大功能和不俗表现而言,人工智能写作已达到一定水准。钱念孙举例,较早的微软小冰出版的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中的诗作几无瑕疵,很难辨是出自非人类之手。其后的机器人小封也出版了诗集《万物都相爱》。此外,还有不少人工智能模型可以逢题作诗,看图写诗,即刻成诗。钱念孙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继续发展终将会取代中低端的文字写作,但目前仍有一定差距。因为人工智能写作的功能仅在诗歌创作上较有成就,但在小说及散文等更多领域效果欠佳,缺乏佳作精品。究其更深层缘由,是因为人工智能对于确定性与格式化的追求,在其所需要撰写的文本中,比如公文函件、通知材料等有明确格式和规制的稿件内容中,其完成度便较高。但若是小说、散文等思想性、抽象性、情感性及随机性较强文体领域,人工智能的完成度通常不如前项。在机器人小封的诗作中,钱念孙认为小封在《爱情》中的语言流畅自然,富有节奏张力,隐喻意蕴丰厚,但他亦认为小封的《一只瘦弱的鸟》存在诸多弊病,例如逻辑混乱、词不达意、意象混乱、整体失质等。在古体诗方面,人工智能的发挥较近体诗更好,无论是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机器人薇薇又或是携程小诗机的诗作,都整体通顺、基本流畅,具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依然存在浅俗直白、词语混搭、语义矛盾等缺陷。

人工智能在学习能力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其对于对于文献语料库及历史数据库的深度学习和模仿,使得人工神经网络得以轻松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7]这部论著中,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对艺术与技术的内在关联展开了深入阐释。本雅明的论述揭示,技术维度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核心命题,艺术价值的本质植根于其物质载体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工业通过技术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机制,不仅强化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更赋予艺术更为直接地复现现实生活的能力。本雅明强调技术的决定论视角与艺术的物质性转向相结合,是确定的趋势。而在这一点上,钱念孙指出人工智能在旧体格律诗、回文藏头诗等方面的良好表现是来自于写作规律要求和文字算法的确定性或限制性。人工智能在艺术的物质性转向上的完成度与人类写作有着重要差异,确定性会束缚人类写作,限制性却能激发人工智能。据此可知,钱念孙在文艺的主体性上认为机器只能是人类的工具和延伸,在文艺的创造性上认为机器不具备价值判断和主导思想。因此,这是一个灵动深邃的人心与精密研算的机芯之间的差别。

同时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写作在价值判断与伦理选择上容易晕头转向,对人类的感官与言行也不能全然领悟。人类的思想情感看似两相矛盾,但实则并行不悖;人类的文化魅力看似迥乎不同,但实则兼收并蓄;人类的是非判断看似各执一理,但实则宽严相济。人类的文艺作品看似千差万别,但实则是在不断追问求索、鉴史通今。人心的潜意识和文艺的复杂性与智力与机能无关,是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掌握领悟的。

尽管如此,但正如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表达的,“新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坚守着自己的根本性

自律”，并且“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8]。人工智能所写的诗文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新的艺术形式与新的文学表达。虽然人工智能目前的创作能力仍有待提升，情感立意仍需要明确，但不意味着就应该被草率轻视或全盘否定。因为文艺的进步就在于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也就是在开掘原有的规制边界后创新求变，而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艺术力量正以信息化的迭代方式进行着。在这个“既抗拒又超越”的发展过程中，人机的存在关系可以不断磨合，人机的文学技艺可以继续切磋，这都有利于焕发人类的创意灵感，让科技更好地为思想助力。

在人机关系上，人工智能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和改变必然导向更深刻的伦理探讨。人工智能在不同的语境下时而为敌，时而为友，钱念孙始终明确地强调在文艺中人的创作主动性和审美观，并且文艺需要“自省与自强”。与人工智能相比，文艺家应当追寻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既要观察总结，也要呈现新意，避免模板套路化。总结而言，若想要与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有根本不同，除了创作者自身需要文化熏陶、文艺品味、历史积累之外，还需要有特色鲜明的文学观察、始终坚守的创新意识。具体来说，就是从外在表现和内在思想上“写好每个句子”，淬炼出有别于机械的人情冷暖、岁月记忆、文化底蕴以及价值判断，让历史与现实共振，让情感与思想交融，让文艺与算法各美其美，让人文与科技各尽其用。

四、外国文学的融汇吸收与影响

文学的民族化是个复杂辩证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异域文艺的内化吸纳既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与提炼里，也潜藏于读者的赏析与解读中。读者对于异域文学的审美感知和接受程度，会以一种无形的反应力和理解力反馈文艺家的创作。进一步而言，异域文学民族化并非仅仅是文艺家根据本地域本民族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实际，有机有度地汲取异域文学的经验方法，同时也在于读者以地域性的习惯和态度评判异域文学，并以受异域文学潜移默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眼光与新视角，反作用于文艺家后续的再创作。钱念孙在《论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态及其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中认为，文学接受与民族化的实践并非仅体现为本土作家对异域文艺的单向借鉴与吸收，而是构成了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参与、彼此互动的双向艺术过程。

传统关于文学民族化的讨论多聚焦于作家如何通过创作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例如作品的形式创新、主题融合或语言改造等显性层面。这虽能解释文化创新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却难免存在视野的局限性与阐释的片面性。首先，忽视了读者群体在文艺作品解读中的有效作用，使文学接受简化为单向灌输过程；其次，弱化了传统审美范式对接受取向的深层塑造，导致对文化内容延续性的解释不足；最后，遮蔽了跨国传播中本土化调适的复杂性，未能充分观照外来元素与在地语境的融合协调过程。钱念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单方面赋予，也是在读者阅读中生成的。读者以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即由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共同塑造的认知架构，决定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因此，当外国文学呈现异域文化时，读者会本能地以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对其进行“本土化”解读，甚至无意识地修正文本的意义。例如，中国读者在阅读易卜生《玩偶之家》时，往往将娜拉伪造签名借款的行为视为合乎道德之举，而忽略其法律争议性；西方观众则因文化背景的差异，更关注剧中个体自由与法律责任的冲突。这种因民族心理差异导致的解读分歧，恰恰是民族化在读者接受层面的具体表现。

钱念孙的文艺思想通过丰富的跨文化案例，进一步揭示了外国文艺吸收的双向性。一方面，读者通过“文化过滤”将外国文艺纳入本民族的理解范畴和情感氛围。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世界各国的改编中，就常被删减或重构以符合当地观众的审美习惯。而自二十世纪初期莎翁剧目在中国登台以来，几乎每次演出都会有适时的调整，八十年代中国版的《威尼斯商人》就淡化了宗教矛盾和种族冲突，犹太人夏洛克的形象被抽离为贪婪的象征。法国人在情感上也曾无法接受莎剧的悲喜混杂的风格，以至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亦对莎士比亚大加贬斥。德国的歌德在其《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就阐述，莎剧之所以能在德国舞台大获成功，正是因为创作者合理地有所抛弃，更有所保留。歌德认为如果莎剧被奉为圭臬，不能改编一丝一毫，那么“它是多么荒谬”。因此，文艺的“过滤”与“变形”接受看似是在扭曲经典、颠覆艺术，实则是民族心理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调适。

另一方面，外国文艺也在潜移默化中冲击并重塑读者的审美心理。例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后，不仅启发了作家对意识流、象征手法的运用，更促使读者重新发现李贺、李商隐诗歌中的超现实意象，以及《天净沙·秋思》中“意象叠加”的现代性。这种反向影响表明，民族化并非封闭的自卫机制，而是开放的文化对话，外来文艺既作为外质被本土化，也为本土文艺注入新质，在本国土壤重获新生。

对于读者而言，减弱或消除不同国家与地域的文艺之间天然的“心理防御机制”其实并非偶然。钱念孙认为这里存在两种因素：一是作品的自身价值，即作品含有的世界属性；二是读者的需求取向，即读者对于

某种异域属性的需求。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普适性越强、世界意义越大的作品也就越容易满足其他国家读者的需求,但具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以及能够以什么角度和层面被接受,则更多取决于读者的文艺取向。莎士比亚对人性与命运的描绘,莫泊桑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大仲马对历史的通俗叙事,都具有强烈的世界属性,各国读者都可以跨越文化隔阂,在其中找到共鸣与启发。又例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评论家茅盾就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了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9]在茅盾看来,当时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需求应该是获得“世界的现代思想”,主要就是提倡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反对封建与愚昧。茅盾在这里既重视作品的艺术鉴赏性,也强调作品的社会功效性。所以,当时译介的诸多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世界意义就起到了传递新知、启迪人心的作用,进而在更深层次被中国读者广泛理解和吸收。

然而,钱念孙并未将外国文学的民族化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削弱或压制。他提出频繁的跨文化接触能够削弱民族心理的保守性,促进更开放的接受姿态。中国对西方小说技巧从拒斥到吸纳的转变,以及油画技法从“匠气”到“艺术”的地位提升,均证明了文化心理的可塑性。这一观点也蕴含了民族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越是深入理解他者,越能反观自身传统的特质。正如西班牙作家德利维斯通过游历欧洲重新认知卡斯提亚的地方性,中国作家王蒙在跨国体验中反思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异同,作家的创作经历就是跨文化的体验和理解,而外国文学作为一面文化之镜,既能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也能帮助读者发现本土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价值。这种双向审视,可以为文化交流互鉴查缺补漏,为本土文学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中曾有过生动的论述:“盖创作犹鱼之初漾于洲渚,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鬣始展也。”^[10]创作在于特别感及个性化,在于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对于异域文艺而言,从“鱼之初漾”到“泳游自恣”是创作、改进过程和过滤、接受过程的结合,也是在寻找归化与异化的平衡点。无论是戏剧、文学、绘画还是风俗,地域性的阅读者与观赏者越是能感知、接触、理解异域文艺,有关的跨文化知识积累愈发厚实,就越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恢宏大气的姿态了解本土,通晓世界。反之,如果一个民族闭关自守、盲目排斥,进而固步自封,观赏者就会固执己见,疲于审美,本土文艺也将逐渐衰颓。

五、总结

诚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11]钱念孙通过对文艺的辩证思考,揭示了文艺创作需以“炼意”锤炼思想深度、以“炼句”雕琢艺术质感的本质逻辑,强调经典之作必须承载人性的真情实感、时代的独特精神与文化的深厚积淀。面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冲击,他并未陷入技术恐慌或盲目乐观,而是清醒指出机器的“确定性”与人类的“创造性”之间的本质差异,即前者依赖算法的规定、数据的分析及模型的训练,后者则源于创作的温度、价值的抉择及历史的自觉。在跨文化语境下,钱念孙通过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重新阐释了文学民族化过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审视与影响的动态关系。文学的审视既非单向的文化移植、盲目接受,亦非固化的传统持旧、一味拒斥,而是创作者与读者者共同参与的文艺交流与实践。因此,钱念孙的文艺观察、判断与解读,恰如一座人文之桥,连接着传统文脉的深邃底蕴与未来文艺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钱念孙.文学的俯察与仰观[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
- [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4]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5] 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6]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7]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9] 黎舟.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4):61-67.
- [10] 刘东方,王佳昕.科技与人文共舞——人工智能文学写作初探[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43(10):1-16.
- [11] 鲁迅.鲁迅杂文集[M].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 [12] 王晓敏.“大文学”视野下文学理论扩容的路径之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02):135-143.

Observing Depth and Forging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 Qian Niansun's Literary-Artistic Concepts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Wang Haonan¹

¹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collection that demonstrates the literary though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 Qian Niansun,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in Literature* fully reflects his profound observations and essential explorations into literary creation, as well as his 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value judgments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methodology of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Qian’s creative philosophy, literary observations, and cultural vision through three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the foundational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works, the deep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impact of foreign literature.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aesthetics and form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rt. Centering on creators of literary works and practitioners of technology, the study asserts tha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lassics must both trac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realities, and focu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humanity;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must root itself in local aesthetic traditions while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spirit of art and literature must elevate artistic taste while expanding spiritual horizons.

Keywords: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i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ing; Foreign Literature; Cultural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